



列斯對於 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蘇·F·康士坦丁諾夫
劉執之譯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八
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

八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林大斯·寧列

展發的論物唯史歷於對

著夫諾丁坦士康·F·蘇

譯之執劉

版出社識知界世海上

月三年〇五九一

列寧
斯大林
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八

一九五〇年三月出版

原著者 蘇·F·康士坦丁諾夫

譯者 劉 執 之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電話 一三一五〇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三元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列寧斯大林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我們的時代，是列寧斯大林時代，在全世界的歷史中，不論就事件發生的豐富性來說，不論就在一個廣大地域——在蘇聯所已經完成的和在人民民主主義各國所正在完成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大變革的規模來說，不論就捲入運動、起而第一次參加自覺地創造歷史的羣衆數量來說，都是曠古未有的。

我們時代的偉大事件，社會發展的新規律性，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科學分析的對象，在他們的天才著作中都會得到科學的反映和概括。這些著作就是意味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的更高階段，意味着作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之列寧主義的創立。

列寧和斯大林在歷史唯物論方面的偉大發現，這首先就是帝國主義時代新的規律性的制定；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關於社會主義能够首先在一個國家個別取得勝利的學說；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蘇維埃形式的發現和社會主義的國家理論的發展。列寧和斯大林最先概括了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巨大經驗。他們發現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發展的新規律性。

列寧和斯大林的科學發現的偉大意義，在於他們是千千萬萬人的革命創造活動的理論基礎。這些發現會在階級戰鬥的烈火中，在爲共產主義的革命的實踐鬥爭中考驗過檢查過。這些科學發現的每一個都足以使它的創造者的名字永垂不朽。同時，這些發現還意味着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科學之發展中最偉大的時代。這些發現對於全世界歷史的命運，對於人類的命運之強有力的影響現在已經非常明顯。而且這種影響將會一年比一年在增長。

歷史唯物論發展中的列寧斯大林階段——這是一個最寬廣的課題。要徹底闡述列寧和斯大林在歷史唯物論方面所創立的新的、天才的、偉大的東西，這需要許多集體的著作。

在本書中，我們只提出一個極其簡略的任務，就是在一般形式上來考察這個課題的某些問題，特別是跟斯大林同志在「論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著作中所提出的新的偉大的東西有關聯的那些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偉大的功績在於他們給了完全統治社會學、歷史編纂、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一切領域中的唯心論以致命的打擊。

跟各種各樣的把社會發展把歷史看作偶然事件、錯失和誤解等等的混亂堆積的唯心論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以嚴格的科學性制定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過程並不是依靠個人、政黨甚至

階級的任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科學地證明社會發展是自然史的、必然的、合規律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

跟唯心論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歷史的主要動力並不是個別人物、英雄、司令官、國王、皇帝，而是人民大眾。歷史唯物論的創始者曾經證明社會史是階級鬥爭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依照規律性必然不可避免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學說，都是在論證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的創造者工人階級的偉大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現，是對於社會的觀點最偉大的革命，是意味着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真正科學的創立的最偉大革命。

到十九世紀九十時代時，馬克思主義者在工人運動中對各種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形式，以及社會學中和史料編纂中唯心論傾向的各色各樣的集合體，已經獲得了決定的勝利。自此以後甚至工人階級的敵人也開始搬弄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衣服裝扮起來，但是却把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東西——關於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開割掉。

在意識形態戰線上，出現了所謂講壇社會主義者（德國的桑姆巴特及其他，俄國的斯特魯威，布爾加可夫以及別的「合法的馬思主義者」）。這一資產階級流派，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社會觀點及歷史觀點，但在根本上却是曲解它們，將它們變成適合於資產階級趣味和要求的東西。從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社會的發展是由一種經濟和社會形式變換成另一種形

式的平順的進化的自發過程。階級鬥爭、羣衆的歷史革命的首創作用，被他們當作「變態的」、「不健全的」、「不合規律的」現象而排除於歷史過程之外。宿命論和客觀主義的精神，貫穿了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見解。

德國的伯恩施坦主義，俄國的「經濟主義」和孟塞維克都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影響的反映。隨着伯恩施坦之後，帶着伯恩施坦有名的口號「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德國和俄國的修正主義者開始宣傳工人運動的自發性理論。他們忽視了工人運動中社會主義自覺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義，馬克思主義黨的作用。機會主義者把在自己的先鋒隊——黨——領導下積極創造歷史的無產階級大衆之革命的自覺活動的地位，讓給了自發的經濟過程，讓給了自生自流。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按着反對資本主義根基的鬥爭路線進行，而主張僅按資本主義「能够履行」「能够容許」的要求的路線進行，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性理論是工團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發性理論是減低覺悟成份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切機會主義的邏輯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五頁）

對自發性崇拜的理論，在第二國際的所有黨派中都廣泛流行。考茨基及其同志們的所謂「生產力」論就是它的特殊表現之一，這種生產力論會替拒絕革命鬥爭作辯護。借口生產力水準的「不夠」，命定無產階級只有束手靜待地球上所有地方生產力成熟的時機到來。

對歷史唯物論類似的曲解不僅出現在伯恩斯坦、考茨基、庫諾夫、鮑威爾、和蘭納爾的著作中，並且也出現在普列哈諾夫的著作中，特別是在他的論文「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知識分子」和小冊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普列哈諾夫曾在這些著作中和孟塞維克時期的別的許多著作中用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經濟唯物論的精神來論述過歷史唯物論。

這種偽造的「馬克思主義」，使這個時期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解除了武裝，迷失了方向，這個時期正是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走入發展下降時期，這個時期正是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關於推翻資本主義問題，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解決，已經是到了完全決定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積極活動、組織性、團結性、和社會主義自覺性的時期了。

在俄國，十九世紀開頭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這個革命在順利的條件下可以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轉變首先決定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程度，組織情形，團結性，決定於它的先鋒隊——黨的理論和政治的成熟，決定於黨對已經成熟的歷史任務的清晰了解。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些條件之中，當民粹派的唯心論者毀滅之後，在列寧和斯大林前面首先提出了反對工人運動中的自發性理論，反對把社會發展描寫成生產力發展的自動過程的庸俗經濟唯物論，反對資本主義和平進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反對貶低羣衆之革命改造的、創造的、自覺的活動之自生自流理論。

自發性的理論極合資產階級的趣味。這種理論應當粉碎。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葉恩格斯就

已經碰到歷史唯物論的新敵人——經濟唯物論。在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寫道，因為主要的敵人是唯物論，所以馬克思和他自然不得不在這些條件中首先強調自己的社會理論的主要命題——關於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之決定的作用的命題。這是當然的，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周詳地考慮到政治和法律的上層建築以及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馬克思本人寫道，理論一旦被羣衆掌握之後，就立刻變成一種物質的力量。而恩格斯回答歪曲歷史唯物論的各種各樣的成事不足者時也寫道，如果我們在歷史中，在社會生活中除經濟基礎外不承認其他事實，那麼我們爲什麼要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強調說，雖然客觀環境，物質條件決定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環境和條件本身，却正是爲人所改變的。

列寧斯大林時代跟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有極顯著的不同。新的時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前面提出了新的任務，提出了新問題，應當給這些問題以清楚的回答。

列寧和斯大林當他們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深刻地科學地去分析隨帝國主義時代以俱來的新的東西，闡明在社會的物質生活範圍內，在經濟領域內尚未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道的新的東西時，他們特別集中注意於徹底開發羣衆的革命活動和歷史的主導性的意義，注意關於主觀因素在歷史上的作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自覺性的作用，進步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進步觀念的作用，黨和政治機構在社會發展中的偉大作用——的問題的研究。

列寧和斯大林同時還對歷史唯物論作全面的研究，這是很明顯的。他們時刻都在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民粹派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哈主義的唯心論，反對托洛斯基的主意論（Voluntarism）以意志爲出發點，認爲它是一切活動的基礎——譯者註）的冒險主義，反對孟塞維克與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經濟唯物論。

在我黨歷史中的某些時期，反對關於社會生活理解中的唯心論、主觀論、主意識的鬥爭，反對那些不清楚考慮工人階級鬥爭的主觀條件的人物的鬥爭——反對這些敵人的鬥爭曾獲得了第一等的意義。

應當考慮的是，經濟唯物論跟唯心論用種種方法交織在一起，並且跟唯心論和平共居。伯恩斯坦、考茨基、雷納爾、托洛斯基、波格達洛夫，和M·H·坡克洛夫斯基就是明顯的例子。波格達洛夫以馬哈主義的精神來歪曲歷史唯物論，同時，他又以舒梁特可夫的態度，以庸俗的經濟唯物論精神來說明種種意識形態過程。例如在「活經驗的哲學」中，他從商品交換關係得出了德莫克里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而從統治和隸屬間的威望關係中，違反歷史的事實，得出宗教發生的結論來。

列寧對歷史唯物論的論述，對歷史唯物論的理解的特徵，可以從他的「反對抵制」這篇論文下面幾行中非常明顯的看出來：「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卓越地把這兩種特點結合起來：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學的冷靜態度來分析事物的客觀情況與進化的客觀過程，另一

方面是極堅決地承認羣衆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同時當然也承認那些善於探索並實現其與某些階級聯繫的個別人物、集團、組織和政黨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馬克思對於人類發展中的革命時期之非常重視，是從他的歷史觀點的全部總和中產生出來的，因為他認為由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無數矛盾只有在這樣的時期才能得到解決。只有在這樣的時期，各階級在決定社會生活形式中的直接作用才會得到十分有力的表現，政治的「上層建築」才會被建立起來，這種政治的上層建築會在革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上支持一個長時期。」（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二一〇—二二一頁）

跟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如桑姆巴特、斯特魯威之流以及跟把革命時期看作「脫離常軌」，看作「社會病態」的表現的現代的一切機會主義者相反，列寧和斯大林在千千萬萬羣衆主動創造歷史的革命戰鬥時期中看到了社會史上的最重要的、本質的和決定的階段。而普列哈諾夫則把十二月的武裝暴動看作是一種錯誤，他說，「本來是不應當拿起武器來的。」

列寧在他的「馬克思給庫格爾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中曾嚴厲批評過普列哈諾夫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列寧把普列哈諾夫跟馬克思和馬克思對遭到失敗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態度兩相比較過。列寧寫道：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羣衆的歷史首創精神。呵，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向馬克思領教

來估計俄國工農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歷史的育創精神，那就很好了。早在事變半年前就預察到事變必遭失敗的這位極深刻的思想家崇拜羣衆的歷史首創精神的態度，跟所謂「本來是不應當拿起武器來的」那種死無生氣、毫無魂靈的迂腐說法相比，豈不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八二頁）

在歷史上常有過這樣的情形，即「此時羣衆甚至爲着沒有希望的事業拼命鬥爭，也是爲今後教育這些羣衆，爲準備這些羣衆去作下次的鬥爭所必需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八四頁）普列哈諾夫型的人們，他們只是徒然地引證馬克思，僅從馬克思那裏採取對過去有價值的，而不是採取有精進創造將來的價值的，所以關於羣衆的歷史創造力之類問題的提出，對於他們是不能理解的。馬克思拜倒於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代之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巴黎公社社員的「衝天」的英勇的首創精神之前。列寧和斯大林拜倒於衝破反對壁壘——沙皇主義——而建立起了蘇維埃政權的俄國工人的英雄主義之前。

偉大的列寧在一九〇七年就已經預言地寫道：「俄國工人階級已經一度證明，並且還會無數次地證明它是有「衝天」的本領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八五頁）

一方面是列寧的評價，另一方面是普列哈諾夫的評價，在這些評價中，不僅反映了他們對於階級關係的評價，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術態度的根本不同，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對於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特徵本身看法，對於羣衆的歷史創造力在這個發展中佔有怎樣一個地位的看法的不

同。

這在他們對於俄國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前途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得到。列寧和斯大林根據俄國二月革命後客觀情勢的正確的嚴格的估計，採取了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他們從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性出發。這個方針的奠立就是列寧回到俄國後第一次演說的主要內容和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綱」，以及斯大林在黨的第六次大會上的報告。

普列哈諾夫妄自尊大和厚顏無恥地把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稱為「夢囈」。普列哈諾夫一九一七年在他的「統一報」的許多論文中，以令人厭煩的執拗證明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還不到成熟的時候，因為俄國生產力的水準還不够，無產階級在俄國還不是人口中的多數。普列哈諾夫一九一七年所看到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最大的不幸，是它的取得政權「太早」。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也是站在這種態度上。

普列哈諾夫跟所有孟塞維克一樣，害怕革命羣衆。普列哈諾夫想看管和阻止無產階級去作大阻的革命行動，正如去看管和阻止一個肆無忌憚的小孩一樣。

列寧和斯大林永遠無限地相信羣衆的革命創造力，相信他們的集體精神、教育羣衆和跟羣衆學習，把歷史發展的命運跟羣衆的革命活動相聯繫。

對於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見解有最偉大的意義的，是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和列寧在十月暴動前夜十一月六日（十月二十四日）寫給

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們的信。

革命危機已經成熟了。巨人似的革命羣衆已經開始行動，並投身到戰鬥裏面了。反革命瘋狂地集結起力量，來打擊布爾塞維克，打擊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叛徒加米涅夫和李諾維埃夫却出而反對武裝暴動。

在此時機，爲克倫斯基的偵探所搜索的列寧，寫信給黨中央委員道：「同志們！二十四日晚上我寫這幾行字時，局勢已經危急萬分。已經是十分明顯的了，現在，遲延起義就真正等於自尋死路。我盡全力來說服同志們，現在一切正如千鈞一髮，當前的問題決不能由會議或代表大會（甚至蘇維埃代表大會也好）來解決，而只能由人民、由羣衆、由武裝了的羣衆的鬥爭來解決。

——歷史不會饒恕那些遲延從事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可以在今天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却延到明天去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政府正在動搖中。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它完全推翻！遲延發動，就等於自尋死路。」（「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三六二—三六三頁）

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者，像宿命論者一樣，只信賴自生自流。變節者、背叛者和胆怯之徒懼怕羣衆，好像懼怕火一樣，生怕羣衆對舊的廢物打擊得太過火。偉大的唯物論者和工人階級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是從歷史是人、是革命羣衆所製造的這樣的命題出發的。當客觀條件對於革命已經存在的時候，事情的結果是決定於馬克思主義黨領導之下的羣衆之革命的勇敢的突擊。

列寧和斯大林把加速歷史發展的可能性跟已經提高到能夠自覺地去創造歷史的羣衆之革命活

動聯繫起來，正因為這樣，社會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此時一天就等於二十年間的和平的進化的發展。

右傾社會主義裏面的列寧主義的敵人，不止一次的非難列寧、斯大林和布爾塞維克是布郎吉主義者，是主意識論者。例如現代批評列寧主義的某一個「批評家」維特在其「蘇聯的辯證法唯物論」一書中寫道：「在它（指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概念中，它想保留馬克思的不變的命題反對將經濟學說跟某種新哲學相調和。但在另一點說來，我們注意到不僅它跟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就是它跟馬克思也有很大的區別。」資本家的這個從僕所不滿的是列寧主義「使俄羅斯離開了別的歐洲國家一般進化的道路。」，就是說，離開了資本主義。似乎這裏面就有着馬列主義哲學的「主意識的因素」。

資產階級的卑賤的僕人決不會了解歷史唯物論而且總是歪曲歷史唯物論。馬列主義的真髓不僅是在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實際存在，而且也在於他們能被無產階級利用於革命。這就是它之有別於過去的講壇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客觀主義之處。

列寧在他的天才的論文「論我國的革命」中，曾總結過布爾塞維克跟孟塞維克和普列哈諾夫關於社會發展的看法的鬥爭。如果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馬克思「資本論」的補充和發展，那麼列寧的「論我國的革命」就是馬克思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補充和發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應當跟列寧的「論我國的革命」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論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道來研究。馬克思寫道，「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在其內部尚有充分餘地足以讓一切的生產力發展之前，決不會滅亡，而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它們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懷內尚未完全成熟時，也決不會出現。」

普列哈諾夫、考茨基以及一切第二國際的「英雄」們，企圖用這個論題來為資本主義的正當性作解釋，而拒絕跟資本家作鬥爭，他們狡猾的避開下面引證的馬克思所述的這個命題，即「人類永遠只能够提出他能够解決的那些問題，因為當更精密的省察時，你可以看到問題本身只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正在推移過程中的時候它才會發生。」

關於每個國家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問題，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意見，是決定於具體的歷史。一個國家轉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成熟的最高標準和指標，不僅是生產力發展的水準和無產階級在該國人口中的對比，而且也是無產階級領導大多數勞動者的能力，他們推翻資產階級的能力，和他們的專政及建設社會主義的組織能力。

列寧和斯大林追隨着馬克思始終強調最重要的社會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就是說，是無產階級。

列寧寫道，「……他們（指孟塞維克和第二國際的領袖們——著者）死守着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爛熟的呆板論據，認為我國還沒有成熟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好像他們中間某些『飽學』先生所講的那樣，硬說我國還沒有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他們任何人也

沒有想一想：一個國家的人民既然碰到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所特有的那種革命形勢，難到他們爲沒有出路的境況所迫而不可以起來奮鬥，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爭得一些並非尋常的條件，以保證文明更進一步發展嗎。」（「列寧全集」二十七卷三九九頁）

普列哈諾夫和孟塞維克在人民中所看到的是歷史的客觀。列寧和斯大林則把革命的人民看成歷史的創造者；在進步的政治機關，在作爲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蘇維埃中，列寧和斯大林看到了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

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都是從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個國家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出發，都是從精確計算在生活中被新社會政治機構所解放所覺醒的難以計數的人民的巨大力量所產生的巨大可能性出發，反對托洛斯基的一個國家社會主義不可能勝利的反革命理論，反對布哈林的均衡論、自流論的富農理論。

由於這種力量蘇聯才能够實現從落後到進步的巨大的歷史飛躍，在最短的歷史期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根本改造了農村經濟，將它從零細的、落後的、生產力低的變成最大的、社會主義的、用進步技術設備的經濟。在這種巨大的社會經濟的革命改造中，布爾塞維克黨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後來又被列寧和斯大林創造地發展了的歷史唯物論爲指南的。

爲了解決這種最偉大的歷史任務，決不能被客觀主義精神所歪曲的「歷史唯物論」來担負這個責任，如像在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所給我們的那樣。在普列哈諾夫的